

□ 孙 超

柳建辉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常对我们讲：为学和为人不可偏废，为学贵精，为人贵诚，二者应该相互兼得，相得益彰。他是这样指导我们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学首先要守正道

第一次见到柳建辉老师是在中央党校主楼他的办公室。我们新来的两个研究生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没有对我们提出什么宏大成套的要求，只是要我们珍惜难得的机会，好好听课，多读关于党史的专业书籍。“当你考进中央党校成为一名研究生时，并不意味着求学道路上的终点，而应看成是新的起点，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既要更好地为学又要更好地为人，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端专业人才”。其循循话语让我们顿感温暖和振奋。临走时，柳建辉老师把他写的《为学和为人不可偏废》送给我们，让我们回去看看。文中写到：“为学贵精，重点不在于学，而在于精，基本要求就是精益求精，在各个环节上力争把学问做得扎实、做得精湛，使自己的研究和对问题的认识更加精专精深，史实、观点和角度阐述得更加精确精炼，文笔文采更加精致精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打磨成学术精品。”

为了使我们尽快踏入学术之门，每次见面时，柳建辉老师除询问我们的听课学习、近期读书和思考的问题等情况外，更多交流的是要注意中共党史学科的特殊性和党史研究的学术传承。这方面，他更多说的不是自己，而是通过向我们介绍中共党史界著名学者的学术观点和治学经验来加以引导。

他曾向我们讲述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先生有关党史研究价值取向的一段话：“党员在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上不能公开宣传和党的意见相抵触的观点，这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中是有规定的。同时，在学术研究和探讨中，要允许自由讨论，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中也是有规定的。”他说“为学贵精首先体现在为学要守正道”。要向学界前辈学习，科学把握中共党史的学科特性，处理好站在党的立场上研究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研究历史的关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这是我们应该恪守的学术信条。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要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来研究党史，将理论、政策和历史的研究同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兴旺相联系，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事写作，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问题，提炼观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说这些认

识，是在党校工作30多年中逐步清楚明确的，是平常的工作追求和学术理念，也是多年来教研部领导和老师们共同讨论得出的共识，更是中央党校党史研究薪火相传的传统。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柳建辉老师重视党史和党的理论之间的互动联系，让我们加深理解“中共党史就是一部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意蕴。学习党史，表面上看是在学习历史，实际上是在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所以，学习中要注意搞清楚的理论同党的历史的内在关系，从中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和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既是党史学习的重点难点，也是研究者自我追求的治学目标。要学懂弄通党的指导理论的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历程和基本经验，学懂弄通理论在实践中接受历史检验的情况，即理论适应或者没有适应历史需要的情况。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队伍的理论构成（政治理论素养不够高等情况）、知识构成（年轻领导干部对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熟悉），柳建辉老师在讲课时注重从历史的发展中讲清楚的理论的历史本源和历史的所以然，以此来提高学员的理论思维能力。

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每一个党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善于作阶级（阶层）的分析。善于进行阶级（阶层）的分析，是党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应该注意对个人、政党进行分析，主要看他们的行动和实践，看他们在实际上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的。恩格斯指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同时，不能忘记阶级差别而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因为人民之中是存在着阶级、阶层的区别的，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要求、愿望是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拥护抗战的都属于人民阵线，其中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但他们的要求、愿望和对抗日态度是不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

培养为学贵精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

学习中，柳建辉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陈铁健研究员到部里交流过的治学经验与方法。他说在党史教研部任副主任、主任期间，约请和主持过多次校外专家的学术交流，老专家、中青年学者都各有独特的治学所长，要求我们积极参加这样的学术活动，逐步培养自己为学贵精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为学贵精既是一项基本要求又是一个追求目标，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既有学业水平的评价内涵又有学识人品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对于一个学人来讲，绝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时的精益求精，而必须不断地追求精益求精。为学贵精没有别的‘捷径’或‘秘诀’，下一番苦功夫、硬功夫、笨功夫，学问上的求精就会落空”。

他说金春明教授是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有五个方面的治学经验：第一，党史研究者必须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构建相当的理论功底，使自己思想上有个主心骨。这是党史教学和研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应对理论战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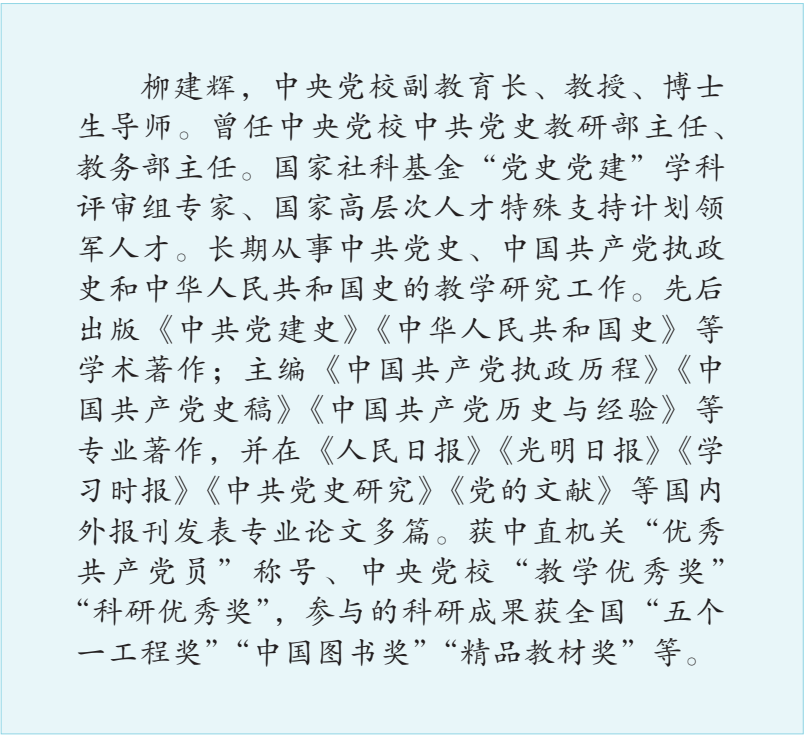
的，应对各个阶级、阶层作具体的分析。

常作比较研究。我们常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使得比较研究方法在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当然，比较方法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其成败取决于指导它的历史观是否正确。二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一定范围，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这就决定了比较研究结论的非全面性和相对性，其结论不能作为对历史现象的完整解释，而只能作为完整解释历史现象的必要补充或者充当一种历史观点的有力论据。三是比较方法不能孤立地进行，它还需要与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

相互借鉴吸收。法无常式。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就中共党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的研究方法，包括从国外学术界引进的心理史学研究法、数学计量（统计）法、系统学法等，都可以借鉴吸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曾强调，应研究社会心理。李大钊在谈到历史理论研究时指出：“须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如心理史学法在党史研究中，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个体历史人物的心理，二是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当然，在运用这些方法之前，应该对这些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真正加以掌握，不能把它与历史唯物论对立起来。

既要更好地为学又要更好地为人

——记中央党校柳建辉教授



复杂性的客观需要。第二，在全面了解党史的基础上，选择一个适当的专题作为切入点，以小见大，逐步扩而大之，并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在选定了适当的专题后，必须将此专题研究坚持下去，长期积累，日久必为功。第四，平时要将读、想、写三者结合起来，做到“三勤”，即眼勤、脑勤、手勤。要带着问题意识去读书，用批判的眼光去发现问题，继而进行下一步的写作与创新。第五，要随时记下好材料、好创意，将业已酝酿成熟的思想及时地留下来、写出来。

陈铁健研究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饱含数年心血的《瞿秋白传》，获得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柳建辉老师向我们介绍陈先生所总结的一些治史的研究方法，如做研究首先要多读、多思；要做到“材料第一，不在论上下功夫”。陈先生还写了一首诗与学人共勉：“往事迷离未足奇，不疑之处应有趣。似明若暗理还乱，研史当无穷尽时。”

柳建辉老师把上述经验整理成文字材料发给我们学习，并说：“治学因学科和个人不同，各有各的特点和方法、体会，但也有一些共性的或者规律性的东西。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学科

素养、科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日久为功的研究毅力、客观公正的分析态度、扎实丰富的专业资料、流畅优美的文字文笔等都是治学所必需的特质，也是治学者特别是党校研究生应该学习和传承的。”“中共党史内容丰富，事件、人物、材料众多，学习中要做到贵在‘一贯’，要在‘始终’”，做到理论与历史相统一、逻辑与事实相一致。

近些年，柳建辉老师一直为中共党史史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而思考，他说：“虽然目前大都认为中共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但从大学科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中共党史越来越具有门类性、综合性的学科特点，是中央党校和全国党校、高校、军校等系统的传统优势学科或重点学科。所以，不应一般地看作是政治学、历史学的二级学科，而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历史学等并行的一级学科，因为它兼有这几个一级学科的特性。”

既追求学业的精深又追求人格的至诚

柳建辉老师不仅要求为学贵精，还强调为人贵诚，认为二者不应偏

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因此，史学著述只有既细致入微又不乏现实观照，方能有大格局，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亦不容忽视。党史兼具学术与政治两种属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二者不可偏废。但毫无疑问，学术是根本和基础。恩格斯曾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史观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因此，政治宣传需要有学术研究做支撑，如此才能避免空洞的说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具体说来，党史始终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这一领域也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往往成为社会思潮交锋的风口浪尖，折射出各种观点分歧。比如近年党史领域出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党史界也曾展开过批判。但总体来看，不但是泛论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而对其具体领域缺乏有针对性 and 说服力的正面回应。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深化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形成人们愿意看、能信服的结果，真正做到正本清源、以理服人。这其实就是用学术讲政治，正如胡乔木所说，“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精密化”，“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

总之，理想的党史研究应兼具义理与考据，融求真与致用为一

度。在《为学和为人不可偏废》中他写到：“一个学者的为人贵诚，一定是要与他的为学联系在一起的，是要体现在为学治学的过程当中的。为学不精、为人不诚的人，很难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抵制外界诱惑与压力，做到静心为学。所以，好多学界前辈都启迪后学者要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坚毅精神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质疑态度。在读研究生期间，要有意识地处理好为学贵精与为人贵诚的关系，把严谨的求学态度与求真的探知精神结合起来，既追求学业的精深又追求人格的至诚，做到为学贵精、为人贵诚，处事贵实、说话贵真。”

柳建辉老师平常工作比较忙，但他没有因此而疏于对我们的培养指导。去年秋天第二次见面会，老师即把他写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分别交给我们，介绍哪里是新修改的、重点是什么。应届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和我们平时的习作，老师看得认真、改得仔细，讲评时既有鼓励，说到存在的一些史实和学术规范问题时，也很严厉。对党史研究后辈，柳建辉老师也尽可能给以提携、支持。去年10月，他主编的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出版后，柳老师买了100本送给党史教研部在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我们每次固定的见面会几乎从未间断，有时为了兼顾他的工作和我们的学习，老师让我们下午四点半去。每次见面，窗外华灯初上，树影斑驳，室内灯光柔和，讨论活跃。

凭着多年的研究，柳建辉老师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建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执政经验、党的建设经验以及改革开放经验的研究上成果更集中。他的著作、文章既侧重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又注重从历史史实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挥党史学科资政育人的作用；既有对微观历史史实的精细考证，也有对宏观历史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如对历史经验、执政经验和先进性建设经验的总结等；既有对党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又有对历史事件或历史发展阶段的总结反思。他曾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题组的首席专家之一，并主持和参加过多项国家和中央党校的重大课题，这应是学界对他学术地位的肯定。



注重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

□ 李庆刚

中共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必须了解和掌握相关研究方法。

从历史事实出发。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是从抽象的概念、原则，已有的本本或主观的观念出发，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从历史事实出发，即要尽可能地充分占有史料，从全面的史料分析中得出科学结论。通过对材料进行分析，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从历史事实出发研究党史，与党史研究要以党的历史决议和领导人的论述为指导，并不矛盾。党的历史决议和领导人的很多论述，是对党的历史深入研究的结果，是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概括，是党史研究的正确指导。

用历史观点观察问题。用历史观点观察问题，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做到：一是在分析党史人物、事件及有关社会问题时，要把他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习近平总书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二是不能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曾说：在考察历史问题时，“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

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每一个党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善于作阶级（阶层）的分析。善于进行阶级（阶层）的分析，是党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应该注意对个人、政党进行分析，主要看他们的行动和实践，看他们在实际上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的。恩格斯指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同时，不能忘记阶级差别而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因为人民之中是存在着阶级、阶层的区别的，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要求、愿望是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拥护抗战的都属于人民阵线，其中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但他们的要求、愿望和对抗日态度是不同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

的，应对各个阶级、阶层作具体的分析。

常作比较研究。我们常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使得比较研究方法在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当然，比较方法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其成败取决于指导它的历史观是否正确。二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一定范围，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这就决定了比较研究结论的非全面性和相对性，其结论不能作为对历史现象的完整解释，而只能作为完整解释历史现象的必要补充或者充当一种历史观点的有力论据。三是比较方法不能孤立地进行，它还需要与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

相互借鉴吸收。法无常式。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就中共党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的研究方法，包括从国外学术界引进的心理史学研究法、数学计量（统计）法、系统学法等，都可以借鉴吸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曾强调，应研究社会心理。李大钊在谈到历史理论研究时指出：“须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如心理史学法在党史研究中，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个体历史人物的心理，二是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当然，在运用这些方法之前，应该对这些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真正加以掌握，不能把它与历史唯物论对立起来。



党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

深度观察

□ 卢 毅

体，既有宏观的问题意识和恒久的现实关怀，又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深的个案研究。“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些都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史研究者应当秉持的品性和坚守的学风。